

王思聪罗永浩被限制高消费 贾跃亭成失信被执行人…… 1400 多万人次身陷“老赖”的背后

■据新华社消息

“限制消费”背后的“老赖”话题

王思聪被北京市二中院列入被执行人名单后,上海市嘉定区法院近日又对其发出“限制消费令”。就在前不久,锤子科技的罗永浩也被法院发布了“限制消费令”。罗永浩为此发表了《一个“老赖”CEO 的自白》,称就是“卖艺也要还钱”。拖欠众多供应商货款及用户押金的 ofo CEO 戴威,也被发布了“限制消费令”。

此外,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因欠下巨额债务未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暴风集团的实控人冯鑫多次被限制高消费后,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宝”的广告语曾经火遍大江南北,金嗓子喉宝的创始人江佩珍前不久也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原因是拖欠数千万元广告费。

何为“老赖”?北京市理格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玉涛解释,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才是法律界定上的“老赖”。“简单说,被执行人是‘有债没还’,而失信被执行人是指‘有钱不还’。一旦被执行人明明有钱却赖着不还,或者隐瞒转移财产等,法院就会认为其失信,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王思聪、罗永浩被限制高消费,贾跃亭因欠下巨额债务未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近期,不少商界知名人士因为债务未还被法院发布“限制消费令”,或者列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数据显示,自国内推出“老赖”黑名单以来,累计上榜者已超过 1400 万人次。法律如何界定“老赖”?被执行人、限制消费、失信被执行人,这些名词背后有何规定和区别?我国目前对“老赖”的惩治力度到底有多大?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肖飒表示,限制消费和失信被执行人都是在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之后产生的概念。被执行人如果履行了义务,就不会和限制消费以及失信被执行人产生联系。“可以说,限制消费离成为‘老赖’还有一步之遥。”

国家发改委官网信息显示,自 2013 年 10 月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制度起,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443 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 2682 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 596 万人次,437 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履行法律义务。

“老赖”境遇：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记者调查发现,成为“老赖”原因多样,有熟人之间借款不还的,有信用卡长期逾期不还款的,也有公司经营不善陷入债务危机的。由于成为“老赖”和具体金额无关,近两年来,网贷行业泡沫破

灭产生了大批借款不还的“网贷老赖”,金额不大但人数不少。

国内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平台“启信宝”曾在今年 1 月做过统计,在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负责人。据这个平台称,在可查询的企业负责人中,董事、监事以及公司高管,包括初创企业的执行董事和监事以上的公司负责人,有近 119 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占比接近 10%。

据“法银媒”平台的失信被执行人大数据分析,自然人“老赖”名单中,年龄段在 41 岁至 50 岁的占比 37%,31 岁至 40 岁的占 31%,51 岁至 60 岁的占 17%,18 岁至 30 岁的占 11%。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限制消费令”不是简单的一纸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明确,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的行为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依法予以拘留、罚款;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限制消费乃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都是惩戒失信的手段,目的是提高失信成本,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法院的判决、裁定,而不要当“老赖”。

上抖音、户外大屏 惩治“老赖”力度不断加大

“借了 20 万元给朋友创业,后来项目失败,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好几次。但人联系不到,钱也追不回来了。”北京白领柳女士向记者感慨。

肖飒表示,“这几年,随着相关司法文件落地,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老赖’的曝光力度越来越大。”据悉,各地法院为对付“老赖”新招迭出,电影院、抖音、户外大屏幕等轮番上阵。

蓝某 2017 年因合同纠纷被诉至法院,进入执行程序后未及时履行义务。经朋友提醒,他发现自己影院被曝光,于是赶

紧到法院将 5 万元欠款履行完毕,将名字从“老赖”名单里撤下。

今年 4 月,钟某刷抖音刷到自己作为“老赖”的高清头像和身份信息在滚动播放,有好几十万的点击量。“亲戚朋友都看到了,我现在就把一万块钱还了,请你们快把我从抖音上撤下来吧。”钟某赶紧央求法院执行法官,并迅速把欠款还了。

此外,一些城市还定期在室外大屏幕播放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进行警示。

郭玉涛律师表示,当前,人民法院执行查控网络与有关部门以及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等单位之间的互联互通正不断加强,期待未来进一步完善网络化协作机制,实现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共享,让“老赖”无处藏身。

目前,有关部门正严厉打击拒不执行行为。最高法院今年 3 月披露的数据显示,近 3 年来,全国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 1.3 万人,拘留失信被执行人 50.6 万人次,限制出境 3.4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416.3%、135.4%和 54.6%。

刘俊海认为,目前,我国正从“基本解决执行难”跨入“切实解决执行难”阶段,应进一步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强化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惩戒失信被执行人不仅能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助于加速商事流转,鼓励投资兴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复兴河旁的津浦（陈塘支线）铁路,全长约 4 公里,是一段始建于 1908 年、目前已停用的旧铁路。当地把这段旧铁路改造为绿道公园,为市民休闲提供了一个新的好去处。
■新华社传真照片

人工智能如何向善——一场科技与哲学的“跨界”对话

人类能否把控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又是否将与人工智能一起携手进化向善?

同样的问题,在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眼中,答案或许两样。近日,围绕人工智能和技术伦理的现实交集,不同领域的专家展开了一场讨论。

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看来,“数字故宫”就是在探索把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落地于博物馆,与文物保护管理、传承利用结合起来,让文化遗产跟越来越多的人群建立联系。

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甚至可能创造一个虚拟世界,供人类

“试错”。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飞跃说,人工智能有望让人类实现“在虚拟世界吃一堑、吃多堑,在现实世界长一智”,通过实与虚两个世界的平行秩序去创造未来。

随着量子计算的发展,人工智能是否会超出人类控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靳峰的疑问,代表了不少人的“焦虑”。“如果出现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它,是不是现在就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看来,大众想象的“强人工智能”目前仍非常弱。

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张正友说,人工智能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是把知识转换成另一种知识,而真正的智能应该超越知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换言之,人工还远未产生真正的智能。

相比科幻电影中的“终结者”,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社会的冲击,可能更早出现在传统伦理方面。比如,公共治理领域该如何应用智能技术。

“从伦理角度来说,如何给它设定一个边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发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刘永谋认为,将智能技术用于公共治理领域,可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提高公众福祉,但也存在智能治理沦为智能操控的危险,因而必须运用技术治理理论来研究智能治理的基本机制。

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提出,以“有针对性的‘技术-伦理’改进”作为破题之解。他表示,通过人文学者与科技专家的对话,实现价值诉求与技术需求之间的“转译”。“未来,人类和机器都要相互理解对方的缺陷,并进行协同进化,这样才能分担责任。”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

- 武汉 -

划定禁用区 严控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为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武汉将划定使用禁区,严控装载机、挖掘机等装用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这是记者 12 日从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悉,根据大气污染源清单调查,武汉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主要类别为农业机械、工程机械,对武汉市空气质量存在一定影响。为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气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武汉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等规定,制定出台了《关于划定武汉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的通告》。

《通告》要求,将武汉市建成区范围以内区域划定为核心禁用区,严禁超过《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Ⅲ类排气烟度限值标准的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在核心禁用区内使用。将核心禁用区以外的全市其他行政区域划定为一类禁用区,严禁超过相关规定排气烟度限值的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在该区域内使用。

武汉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推动相关工作落实,《通告》还要求,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使用人(单位)应配合有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监督检查(含检测),不得拒绝或弄虚作假。同时,鼓励安装精准定位系统及实时排放监控装置,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新华社武汉 11 月 12 日电